

## 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卢 建 第 2 期笹川生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又是樱花烂漫的季节了，每年的此时，望着那粉红如霞的满树繁花，记忆的闸门就一下子拉到了 20 多年前的日本。

1987 年我顺利地通过了 WHO 的英文考试，正在联系去美国时，学校告知日本世川医学奖学金开始在国内招收第二期研修生。我们这代人对日本的印象几乎都是从抗日战争的小说和电影得到的。对战后这个亚洲邻国的关注和了解比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少的多，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才使我对战后日本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第一强国充满好奇心，希望有机会在学习日本先进的医学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多的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民。

1988 年春天，也是樱花烂漫的季节，我来到了我的研修地—日本大阪大学医学部第二病理教室，见到了我的指导教官松本圭史教授。松本教授当时正担任大阪大学基础医学部部长和日本内分泌学会理事长，他很吻合我对日本教授的印象，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一看就是很严谨的人。松本教授是做激素依赖性乳腺癌增殖机制研究的，在我去之前，他领导的课题组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在国际一些著名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去日之前我就已查阅了该实验室已发表的多篇文章，对他们的工作很感兴趣，希望能尽快加入他们的工作中去。一见到松本教授，我就迫不及待地问起了我的课题，可他说你只有一年的时间，又存在语言问题，来这里就不要独立做课题了，主要是看别人做实验，学习科研的思路和方法。我知道这对我而言，是一条最轻松的路，但是我好不容易得到这次出国进修的机会，自然想在教官的指导下，独立进行课题的研究，以使自己得到更多的锻炼和提高。我和导师谈了我的想法，也请他相信，我不会让他失望。在之后的工作中，我每天很早就到实验室，很晚才离开，一边看他们实验，一边看看文献。我的实验带教老师西泽恭子副教授在实验中言传身教，同一实验室的田中博士，以及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对我在实验中碰到的问题，也都有求必应。因此我很快就进入了情况，熟悉了他们正在进行的课题和逐步掌握了他们常用的方法。

一个多月后，考虑到我在国内硕士期间从事过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研究，松本教授在征得了我的同意之后，给我确定了课题：糖皮质激素对小鼠乳腺癌细胞增殖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在完成课题的过程中，指导老师们创造性的科研思维、严谨的科研作风和勤奋执着的工作态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松本教授的指导和教研室老师们热情帮助和悉心指导下，我只用了 6 个月就顺利完成了研修课题。我的工作发现糖皮质激素可以诱导小鼠乳腺癌 SC-3 细胞合成并分泌 FGF 样的生长因子，后者通过自分泌机制促进该细胞的增殖。该工作总结成文后当年年底前就

投往美国癌症协会杂志“Cancer Res”，并很快就被该杂志接受和发表了。松本教授很高兴，他认为按照我的科研进度，如果能延长一年，就能在大阪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当时国内没有几个病理生理专业有博士授予权，能在日本拿博士学位，是我的梦想。但是按照世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的规定，研修生去日后是不能延长的。松本教授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亲自给日中医学协会，中国卫生部和当时我校校长写信，恳切希望能准许延长一年。他还为我争取到了继续在日学习的经费，并亲自当我的保证人。松本教授对我前途和生活的关心，使我深受感动。在被获准在日延长的一年中，我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又在 Anticancer Research, J Steroid Biochem Mol Biol 和 Cancer Research 等杂志上发表了第一和第二作者的文章。1990年初，我顺利通过了拿论文博士需要的英文和日文考试后，开始做答辩准备。由于我的博士论文都是用英文发表的，而且也只是在去日本之前学了三个月的日文，我问松本教授是否可以用英文答辩，他说你既然在日本拿学位，就应该用日文答辩。为此我把论文用日文写成答辩的发言稿，西泽恭子老师不仅帮我修改文字，还帮我录音，让我反复听，反复跟着念，以纠正发音的不准确。答辩时，由于准备充分，我发挥得很好，受到了答辩委员会教授的一致赞扬。现在想来，我当时已37岁，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完成论文的工作，并用日文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实属不易。这其中固然有我个人的努力，更有日本指导老师们辛勤培养的汗水。

回想起来，那是我受益最为丰厚的一段经历。除了专业上的进步，教研室的老师还特意安排了很多机会让我从各个方面了解日本。西泽恭子老师经常带我和他们全家一起去旅游，春天去大阪城赏樱花，秋天去京都看红叶；教研室其他老师则邀请我和他们的家人一起欢度新年和传统的偶人节；我还和日本朋友们一起参加各种民间活动，如大阪天神祭，京都祇园祭和盂兰盆节等，一起欣赏宝冢歌剧和歌舞伎表演。印象深刻的还有世川医学奖学金组织我们一二期生到箱根旅游，我们不仅欣赏到了芦之湖和富士山的湖山相映，在从大阪到东京的过程中我们大阪的同学还和名古屋及静岗的同学汇合，一起登上了富士山。这一切不仅使我感受了日本山川的美丽，还了解了日本文化和民俗的丰富多彩。日本是个既现代，又传统的国家，能在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同时，精心恪守和传承传统文化，这方面非常值得我国人民学习和借鉴。

去日后，日本环境的整洁、管理的有序，人民的自律和有礼貌、特别是日本人拼命工作、认真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日本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差距。我听到不少日本人和我说，我们日本是岛国，资源有限，我们只有努力，才能生存。这种民族层面上的忧虑感，可能就是日本民族拼命工作，发奋图强的驱动力，也是战后日本能迅速崛起，成为亚洲最强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比较起来，我们在自己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幅员、丰富的资源等优势中沉湎的太久，我们在骄傲的同时，少了忧虑和反思，好在我们的民族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日的生活也促进了我对日本人民的了解。

记得第一次在大阪中心的梅田乘地铁，由于找不到车站，只好操着不很流利的日语问路，被问的日本人察觉到我的初来乍到，他就连说带比划的告诉我如何走，我点头说明白了，其实只记住了他的前几句话。我往前走了一会儿后又碰到了叉路口，正不知所措时，突然听到后面有人说，向右转，回头一看，原来就是刚才给我指路的那个日本人，他说他不放心我，所以一直在后面跟着我，最后他把我带到了地铁站，看我买好票后才离去。这次路遇，使我感到了日本普通百姓对中国人的亲切和热情，使我刚到日本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一下放松下来。在和日本人民交往的过程中，还有不能回避的就是中日战争的问题，记得当时正值日本战争孤儿回日寻亲的高峰时期，一次和我房东的弟弟谈到此事，他说当年日本侵华，给中国人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中国人却能以德报怨，收留抚养日本战争孤儿，可见中国人心胸之宽广，人性之善良，这点是让日本人汗颜和羞愧的。

在日本拿到博士学位后，美国 Texas 大学的一位教授希望我能去美国工作，而学校也希望我能回校。我面临着是回国还是去美国的选择。当时正值 6.4 之后不久，回国的人很少，在我犹豫不决时，松本教授找我谈了话。我说了我的担心，怕回国后国内科研条件不好，难以开展工作。松本教授说，当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时，日本的也不像现在那么发达，正是你们国家还比较落后，才需要人才。当年要不是 60 年代有一批人从国外回日本，日本也不可能发展那么快。松本先生的话语重心长，给我很大的震撼，帮助我下了回国的决心。

回国后不久，我就被破格晋升教授，在之后的几年中又成为教研室主任和博士生导师。我把在日本学习期间学到的科研思路、方法和手段，用于我的科研工作中。回国后继续进行着肿瘤内分泌和核受体病理生理学方面的研究，在国外发表了多篇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50 多分；主编了《受体、信号转导与疾病》等专著，并担任了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受体和信号转导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中国病理生理学会的副理事长。迄今为止我共培养近 40 名硕士和博士。我像松本教授当年对我那样对待我的学生。对他们工作中严格要求，生活上关心照顾。2004 年我的博士生陈光椿也作为世川医学奖学金的研修生到日本九州大学学习，他在日本一年，就在著名杂志 J.B.C 上发表了文章。我今天取得的一切，离不开在日本研修期间，各方面打下的基础。我的指导教官松本教授在我回国后不久就退休了，但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永远不会忘记松本教授和其他老师对我的培养，所有日本朋友给予我的帮助和关心。

从我作为第二期世川医学奖学金的研修生回国算起，一晃 20 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富强中国的百年梦想逐渐变成了现实。而我们这些当年的赴日研修生，今天自己也大都成了教授或各单位的骨干，活跃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世川医学奖学金项目为 2000 多的中国研修生打开了了解日本乃至世界的窗口，不仅促进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们每个研修生的人生轨迹。作为这个项目的受益者，我们有责任为促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不断努力。